

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

——基于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经济思想的考察

邓 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中南地区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包括一批民国时期经济学教授在内的中南地区六省六校经济学资源并入中南财经学院,学校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本文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经济史学三个方面,对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梳理。研究发现,这些教授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鲜明的应用型特色。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中南财经学院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1)02-0147-10

DOI:10.19639/j.cnki.issn1003-5230.2021.0024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日趋完备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日渐壮大的经济学学者队伍、日益丰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推动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南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汇集了多所知名学府和众多专家学者,成为近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财经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批正规化的财经类院校,其前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1948年8月创建的中原大学。在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家在中原大学原财经学院基础上,合并河南大学经济系,武昌中华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的财经学院,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及南昌大学经济系,广西大学经济系及会计银行系,中山大学社会系劳动组等系科,组建了中南财经学院。

上述院校均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积淀。中山大学1924年开设经济系,在后来的办学历程中,岭南大学、勸勤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科并入,使其经济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之初即开设经济系和商学系,国立商学院、民国大学先后并入,荟萃了众多学者和学科资源。河南大学1927年开设经济系,南昌大学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广西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也都较早开办近代经济学教育。

通过院系调整,中南财经学院事实上集合了中南地区大部分经济学资源,学科专业结构得到进一

收稿日期:2020-09-01

作者简介:邓 杨(1980—),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副研究员。

步优化,学校先后设立财政信贷、合作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会计、统计、国民经济计划、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经济地理等系室,构建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学高等教育体系。1953~1957年间,学校有教授87人、副教授22人^①,远远超过全国高校平均水平^②。他们中间大部分毕业于海内外名校的经济学或相关专业,接近一半拥有海外学习经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为学校财经类学科整体进入全国领先优势学科行列奠定了基础。因此,透析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南地区经济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概貌和整体特征,从区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中南财经学院所汇集的民国时期教授群体的论著,被当时的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下文分别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介绍相关研究成果。

(一)论著在民国时期的反响

钱穆、马寅初、顾颉刚、萧一山、唐庆增、商章孙、秦佩珩等民国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知名学者一致给予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高度评价,认为该著作是国内经济史学界难得的佳作。《图书评论》^③杂志1932年第1卷第2期和第3期对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进行评介,指出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特征。李权时在《经济学季刊》(1935年第6卷第1期)和《复旦学报》(1937年第4期)发表书评,评价胡善恒的三本著作(《赋税论》《公债论》《财务行政论》)为“吾国近年财政文献上之可喜现象也”^[1]。陈正谟关于民国时期农工和地租问题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薛暮桥在《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7期)对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进行了述评;《图书展望》(1936年第1卷第12期)、《农报》(1936年第3卷第28期)、《经济统计月志》(1936年第3卷第9期)等期刊评价陈正谟关于各省地租形态与租率、农工雇佣制度及供需状况的调研为土地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赵兰坪、陈岱孙对曾仲谋的《广东经济发展史》申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进行审查时,评价该著作资料丰富、态度严谨、理论体系完密,在广东地方经济研究论著中极具参考价值^④。《乡村建设》杂志1933年第2卷第22~23期推荐了刘光华的《农业政策》一书,评价其“是研究农业政策者不可不读的一部书”。邱瑾在《华年》1937年第6卷第2期“读书副刊”评价侯厚培、侯厚吉合编的《农业金融论》虽译自日本学者小平权一的著作,却克服了原著冗长重复的弊端,且能结合中国实际,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张人价的《湖南之谷米》(生活社,1940年版)、《湖南之矿业》(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1942年版),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41年版)在民国时期都曾被译为日文出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他们著述的研究

胡寄窗(1984)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列举了马哲民、朱剑农、胡善恒、侯厚吉、谭寿清、彭师勤、秦庆钧等学者的著作。杨祖义和冯兵兵(2019)认为罗章龙走出“欧洲中心论”为旨归的经济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第一代经济史家群体建立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的典型代表”^[2]。洪思予(2020)认为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比较注重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出发,并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特点”^{[3](P5)}。邹进文(2008)分析了胡善恒对超然主计制度的批判,认为胡卫之争实际是“英、美财计组织制度的引进与运用”之争;他指出蔡次薛的战时财政思想从财政经济角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口诛笔伐,对国民党战时财政政策的评价和肯定,在当时特殊环境、特殊时代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4](P259,281)}。周诚(2003)、钟祥财(2014)对朱剑农的《土地经济学原理》在近代土地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给予了肯定^{[5](P25)[6](P429)}。三田刚史(2019)在《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撰文评价了朱剑农的农村经济思想^[7]。程霖等(2018)认为马哲民等学者在《大学月刊》1942年第1卷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视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8]。

张爱勇(2013)对金根宪、秦庆钧、蔡世英、罗云等在财政、会计领域研究成果的学术与实务价值予以高度评价^{[9](P19-40)}。张申、信瑶瑶(2020)对刘耀燊和吴澄华的民生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

为刘耀燊将民生经济学的主张结合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之中进行细化,“更贴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吴澄华则阐述了民生经济学以价值、生产、分配的“三分法”为主要构成,强调了孙中山的价值论“是一种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论”^[10]。倪俊明(2002)认为曾仲谋是较早对社会经济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所著的《广东经济发展史》一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1]。颜昌盛(2012)对方铭竹在《乡村建设》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农村合作社研究的文章进行了详细分析^{[12](P59-91)}。夏国祥(2006)认为吕调阳根据国情灵活运用关税税则的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能反映当时国人对关税制度的认识水平”^{[13](P258-259)}。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为简要介绍,比较零碎,需要系统化的研究来抓住其中的特征与规律,从而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由于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的限制,本文选取了中南财经学院颇具代表性的29位教授(含副教授)作为研究对象^⑤,根据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结合现今的学科分类标准,分为三大类进行梳理:第一类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经济学理论本土化发展;第二类是应用经济学与工商管理学研究,包括农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会计学等研究取得的成果;第三类是经济史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今的学科分类,经济史学应置于理论经济学中进行考察,但由于当时经济史学研究成果颇丰且影响尤大,故单独把它列出讨论。

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主要著述及其经济思想

(一)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本土化三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中南地区具有传播先进思想的优良土壤和良好的革命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21年,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来自中南地区(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的代表就有11人。曾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的李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并长期在武汉进行教学工作,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与同期京、津、沪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相比,中南地区学者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事业。其中,中南财经学院的马哲民、罗章龙、朱剑农等学者以讲台和著述为阵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马哲民是中国民主同盟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之一,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南财经学院的首任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马哲民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攻方向,同李汉俊、陈潭秋一起组织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大东书局,1931年版)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自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⑥。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阐述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变革,下编介绍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马哲民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形态转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和运动变化规律进行了详尽分析。《社会经济概论》中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刘英士评价该书是值得专家细评的马派(马克思主义)出版物^[14]。傅筑夫以万字长文对马哲民的观点进行细评,他认为马哲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认识不深刻、不全面,甚至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15]。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渐的高峰期,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马哲民和傅筑夫的争鸣正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速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政治活动家,也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共党

史专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罗章龙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德语翻译组组长,组织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⑦等。早年,罗章龙致力于指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开展产业工人状况调查,面向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到高校任教后,罗章龙从学术研究视角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批判,他指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以西方历史为源流、以他国国情为蓝本,必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提出对中国经济要从重构经济理论和革新经济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16]。

朱剑农是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曾任中南财经学院副院长。朱剑农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他的专著《土地经济学原理》(西部印务局,1947年版)是我国土地经济学初创期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朱剑农在书中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研究土地问题,主张运用暴力改革手段废除土地私有制。他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自耕农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比较研究,揭露了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维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及其虚伪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真正符合中国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朱剑农在国统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的土地改革实践形成了呼应。

2.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南地区也有一定的传播,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相比,则显得相对滞后。除了武汉大学刘秉麟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湖南大学潘源来的《经济学原理》(国立湖南大学出版组,1948年版)等少数几本著作较有影响力外,中南财经学院几位教授的著作均是普及性的通俗读本。如刘光华编写的《经济常识》(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主要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资本与资本家、需求供给理论、货币金融、失业、财富保值增值、通货膨胀、银行业务等基础知识。张人价在《经济学原理》(宇宙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对经济学的概念、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经济原则等概念进行了介绍。罗云在《广大计政》(1948年复2第2~5期,复3第1~4期)连载书稿《经济现象》,综合了各派经济学说的观点,用人类主要经济现象来阐释经济学原理。谭云峰编著的《经济学》(广州实用高级会计科职业学校,1940年版)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流派,并用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分法”来解释经济基础理论。

3. 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理论,融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创新、改造,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在经济理论上进行的探索。民国时期,民生主义经济学一直为研究热点,甚至出现了畸形的“繁荣”^[17],这在中南地区经济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吕调阳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版)用生产、消费、交易、分配“四分法”解释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提出要“一方面统制私人经济,一方面计划国家经济,使依照一定的意识地目的而进行,以达经济的理性化”^{[18](P2-7)}。刘耀燊在《养民经济论》(民族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中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要以养民为目的,以社会福利为前提,由全民共同建设,经济建设成果由全民共同享有^{[19](P1-8)}。吴澄华用价值、生产、分配“三分法”分析民生主义社会劳动各环节,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拓展,建议运用社会互助达到经济改进的目的,这是一种结合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创新^[20]。曾仲谋提出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民生主义的民族经济,即“进行其全民性、民主性与大同性的社会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的(三民主义)社会底真实基础”^[21]。

总体来说,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虽然民生主义经济学已经关注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问题,认识到西方庸俗经济理论的缺陷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甚至还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表述,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大框架内的局部改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本质区别。

(二)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各部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由于区域特征,学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成果比较突出的主要有农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和会计学五个学科。

1.农业经济学

根据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的统计,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农业经济研究的结果并不是最多的^⑥,但中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一直处在繁盛和高产的状态。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二是中南地区区位优势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位于长江中下游,历来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民国时期,农业虽仍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部分,但受阶级剥削、租税、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普遍萧条,即使是一向富庶的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也处于迅速衰败的过程中^[22]。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经世济民的情怀,促使他们把农村经济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以朱剑农和刘光华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都曾参与发起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⑦并担任理事,同时又代表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剑农对农村问题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以及对对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判断。在《农村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朱剑农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做了全景式描述。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1)土地私有高度集中,以川、康、滇、黔、陕、甘、宁、青8省为例,60%以上的土地所有权在总人口不到4%的地主手里;(2)租税沉重,农民苦不堪言;(3)受剥削阶级压迫的农村劳动人口庞大,约占农村总人口的73%;(4)农业劳动力收入微薄,生活困难,农业平均工资只有同期美国农民平均工资的9.3%;(5)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下;(6)农村金融现代化程度低,高利贷现象严重;(7)农产品的运销被买办和官僚资本垄断,层层盘剥。对此,朱剑农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铲除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层,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制度,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形态,彻底解放农村土地生产力^[23](P10-95)]。

刘光华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参考西方相关理论成果,对民生主义农业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他在《农业政策》(南京书店,1932年版)一书中提出,增进农村福利的四大政策,即农业土地政策、农业劳动政策、农业金融政策和农业合作政策^[24](P65-256)],后又陆续补充了农业生产政策、农业经营政策、农业分配政策等^[25]。刘光华认为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政策,他主张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增价归公、扶助自耕农、推行限田制、国营垦殖事业等方式,和平渐进地实现“土地国有”,同时还提出整理田赋、规模化经营等改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主张^[25],与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取向如出一辙,体现了当时国统区经济学界为配合国民政府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政策的施行,在理论上进行的铺垫和解读。

陈正谟、张人价两位学者以农情调查见长,基于大量扎实的调查统计开展农村问题研究。1934~1936年间陈正谟主持了全国地租问题和农工问题调查,调研报告《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和《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先后出版。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陈正谟对土地私有制多有维护,他认为土地高度集中引起地价高涨,地主即使不断加租依然获利不多,地主与佃农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他主张在维持现行租佃制度的情况下实行减租政策^[26](P7-9)]。陈正谟的著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薛暮桥对陈正谟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在立场上的分歧决定了两人在“三农”根本问题上的歧见。张人价1934~1938年在湖南省经济调查所、湖南省总行经济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期间,参与了湖南资源与特产调查,其主笔的调研报告《湖南之谷米》于1936年由湖南省经济调查所印行。张人价在调研中发现,湖南谷米价格受生产过剩或不足、供需不能调剂等因素影响而波动,易造成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现象,对此他提出要兼顾生产者(农民)与消费者(一般人)利益、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实施谷米生产政策和谷米调剂政

策^[27](P94-104)。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状况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张人价的研究为农业经济改进和农业政策制定积累了大量资料,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掀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热潮,陈正谟和张人价的著作也逐渐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租佃率、出租土地数量、农户土地规模、租制和地租率时引用了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中的史料;在介绍民国时期中国农产品价格时引用了张人价《湖南之谷米》中的资料^[28](P81-93)。可见两位学者的著作已经成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重要参考。

方铭竹、张国维两位学者曾短暂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从乡村建设派思想出发,发表多篇论文阐述开展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农业电气化、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等观点,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土地所有权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见解。

2. 财政学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财政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财政思想、国家干预主义财政思想、民生主义财政思想、战时财政思想四个方面。胡善恒、梁式文、吕调阳、蔡次薛分别是这四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胡善恒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部学习,师从英国经济学家拉斯基,是早期将西方财政理论引进中国的学者之一,同时他还身兼高校教授和国民政府计政部门要职,是典型的跨界学者。1934~1936年,胡善恒的著作《赋税论》《财务行政论》《公债论》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被列为“大学丛书”^⑩。胡善恒深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以追求收支平衡为取向,主张合理负担赋税,改革公债制度,实现以“最小牺牲求社会之最大福利”的目的。胡善恒的著作出版后,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李权时评价胡善恒的赋税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对东西方的赋税理论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洵可称为杰作”^[29]。

梁式文的著作《财政学大纲》曾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甲等学术奖助金资助,1943年由广州大学出版,1946年再版。《财政学大纲》吸收了英美在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财政理论新观点,以“量出为入”为总原则,以“支出”为主线,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内容上看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较深。崔敬伯在为《财政学大纲》所作的序中评价梁式文的著作“审思立论,颇能不受旧形态的拘束,融汇各家,独引妙绪,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30](P1-2)。

吕调阳的财政思想以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提出政府通过对财货的管理和使用,实现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他认为我国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批判地继承欧美各国财政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建立现代化的民生主义财政制度,通过收入与支出的调节,实现国防与民生并重、国营与私营并行、农工商矿各业并举^[31]。

蔡次薛是民国时期研究战时财政享誉盛名的专家之一。抗战期间,中国经济由平时经济进入战时轨道,为了配合军费筹集和战时组织动员,蔡次薛积极建言献策,在《中央日报》连载《各国战时财政政策》,后由中央日报湖南分社于1942年结集出版。《各国战时财政政策》通过对侵略国和反侵略国的财政政策的比较研究,提出符合国内实际的战时财政政策,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

3. 金融学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金融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学方面,相关译著、自撰著作和论文都比较丰富。

(1)译著。曾在中央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处工作的留美学者谭寿清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霍曲莱的《中央银行经营论》(世界书局,1947年版),对霍曲莱的纯货币商业循环理论、信用调节理论进行了介绍;此外,谭寿清还在中央银行《经济汇报》上发表了《英国银行业务分析》《论战后国际贸易与国际汇兑》《论国际信用与通货计划》等多篇译文,对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等进行了介绍,促进了西方银行理论的传播,为国内货币银行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方铭竹对资产阶级货币银行理论和社会主义货币银行理论均有译介。1938年,方铭竹和王清彬

合译了美国经济学家启尔邦的《货币银行原理》上册,下册为方铭竹独译,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后又多次再版)。这套译著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对货币、银行、经济组织全体以及经济活动的关系进行分析,补充了二战以后各国放弃金本位货币与汇兑政策等内容,并且对货币数量说、管理通货、购买力平价等理论进行了评介,是当时少有的比较系统的货币银行学书籍。马寅初和周作仁为该书作序,评价其对我国研究货币银行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2](P1-3)}。方铭竹认为苏联的合作银行在世界合作事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当时国内学界对苏联合作银行关注寥寥,因此他翻译了英国合作学者巴鲁的著作《苏联合作银行》(审淇出版社,1936年版),填补了国内合作银行理论研究资料的空白。

(2)自撰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炳炎《纸币与战争》(正中书局,1940年版)和刘耀燊《货币导论》(坪石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纸币与战争》对中日两国战时货币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肯定了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历史作用,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可谓应时之作。《货币导论》融合了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对货币的本质、货币进化史及通货管理等理论进行了分析,为国民政府的通货统制政策提供了学理阐释。

(3)专题论文。张恒遇在《财政评论》(1941年第6卷第6期、1943年第9卷第5期、1944年第12卷第1期、1945年第13卷第2期)、《金融知识》(1942年第1卷第4期、1943年第2卷第3期)上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了西方货币价值学说各流派理论,分析了货币供给、需求、流通速度等影响币值因素,提出国内预算和国际收支平衡是稳定币值的前提条件。郑启校在《新建设》(1942年第3卷第5期)、《时代中国》(1943年第8卷第1-2期)、《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年第3卷第1期)、《经济科学》(1942年第2期)、《经济论坛》(1949年第1卷第5期)等期刊发表5篇论文介绍苏联货币制度,提出计划性、公有制和阶级性是社会主义货币制度的本质特征。

4.贸易经济学

以侯厚吉的“商业三部曲”,即《商业通论》(与其兄侯厚培合著)、《市场学》、《商业地理》最具影响力。侯厚吉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系,不足20岁时即以大四学生的身份参与大东书局《世界经济丛书》的编纂工作。毕业后曾任职上海银行总行调查室、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国际贸易局,从事中国国内外贸易及金融方面相关研究,参与编写《商品调查丛书》《中国实业志》等书籍。《商业通论》(黎明书局,1933年版)系统介绍了商业种类、商业组织、商业管理、商法、国际贸易、商业政策等概念与原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国内贸易原理自撰著作。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曾再版6次。侯厚吉独撰的《市场学》(黎明书局,1935年版)分析了产品经过商业途径由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转移过程和经济规律,是较早系统介绍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的著作。在《商业地理》(黎明书局,1936年版)一书中,侯厚吉重点探讨了国际商业交通、商港和国际贸易力量对比等问题。以上三部著作从原理、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三个视角研究贸易问题,构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

此外,侯厚吉和刘耀燊还发表多篇论文讨论国际贸易平衡问题。侯厚吉受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认为平衡国际贸易收支,不能单方面地堵进口,更要注重疏通出口。他在《平衡国际贸易问题》一文中提出“一方面使入口的商品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则提高出口贸易的增进率,使贸易趋于平衡”^[33]。刘耀燊认为贸易保护是“产业落后的弱小民族国家促进整个民族资本及经济之成立与独立的手段,是为争取民族解放及独立的经济手段”^[34],他在《国际贸易之政策与其理论》一文中分析了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提出实行贸易保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5.会计学

民国时期中南地区会计学发展较为迅速,其中广东高校会计学教授群体的研究引人注目。广东是我国近代第一批开埠的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埠。为了配合商贸业的发展、提升工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广东高校学者注重引进先进的管理思想,以会计学为核心推动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南财经学院蒋一贯、蔡世英、金根宪、秦庆钧、谭云峰、罗云等学者都曾是广东高校会计学教授群体中的骨干力量。

1934年,蒋一贯与卫挺生、潘序伦等一起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会计学社,学社汇集了一批会计学

家和学术骨干,通过办刊和学术活动,致力于会计学的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蔡世英 1948 年出版的《中国现行主计制度概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8 年版)一书,对国民政府主计制度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一些建议还被国民政府采纳。潘序伦对该书给予好评,将其列入立信会计丛书^①,并亲自为之作序。秦庆钧编写的《会计学精义》(世界书局,1946 年版)对会计学原理、财产的特质、会计对象、会计实务等进行了介绍,他的著作《计政法规释要》(广州大学,1942 年版)对国民政府主计系统和审计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他还编著了《审计学》(广州大学计政训练班出版部,1946 年版)、《政府、企业审计学纲要》(广州大学计政训练班出版部,1947 年版)、《地方财政学(总论)》(广州大学,1948 年版)、《应用统计教本》(广州大学,1947 年版)等多部教材,对会计、审计和统计等从业人员学习相关知识有很好的辅导和参考作用。金根宪独著的《簿记与会计》(广州大学,1946 年版)、《计政法规讲述与岁计实务》(广州大学,1947 年版)、与罗云合著的《政府会计原理与技术》(广州大学,1947 年版),谭云峰独著的《政府会计》(广州大学,1947 年版)等著作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除广东高校会计学教授群体外,分别来自河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的王牧罕、杨时展、林树湘等学者在会计学理论、工业会计、政府会计等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三)经济史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经济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从理论倾向看,主要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史学两大类。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史学界开始了社会史大讨论,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理论传播的热潮。

在翻译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著作中,以石滨知行的著作最为流行。石滨知行是日本唯物主义经济史学代表人物,陈绶荪和曾仲谋分别翻译了他的三本著作《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陈绶荪译,新世纪书局,1931 年版)、《欧洲经济史纲》(陈绶荪与邓伯粹合译,中华书局,1936 年版)及《历史与经济组织》(曾仲谋译,方圆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36 年版)。这三本著作从人类对历史现实认识的发展、经济思想史的发展、经济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的任务等方面切入,运用唯物史观对各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分析,对各学派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对当时中国经济学者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寻找发展出路有一定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除译介国外著作外,马哲民的《经济史》(南强书局,1929 年版)是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史学的自撰著作之一。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四种生产方式为线索,着重阐述了生产工具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引起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经济所替代,尽管篇幅不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史学

在民国时期经济史学发展中,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不容忽视。罗章龙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两部著作《经济史学原论》和《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罗章龙在《经济史学原论》(经济新潮社,1947 年版)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元历史观,新的历史分期论、分型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创化三因素论”,如潘源来为该书所作序中写道“史期论乃研究经济史纵的连续进程,史型论则理解其横的交互影响,而二者又以全元哲学基础为依归”^{[35](P2)},开拓了经济史学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

《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 年初版、1947 年再版;下册:经济新潮社,1948 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作为书名的著作,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奖金。罗章龙在书中总结梳理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特质,将中国国民经

济进程从原始经济到明清帝国经济划分为八个阶段,详细阐述了各个阶段民族经济演化的特征与价值。该书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以富国强民为落脚点,结合中国的地理、人口、技艺、政治、民族等特点阐述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在近代经济史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书季刊》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史》是“近年出版中国经济史中之佳构”^①。顾颉刚、萧一山在《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申请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评奖的推荐书上写道:“本书作者搜集材料历二十年之久,对于汉以前之国民经济状况,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实为极有功力之作。”^{[3](P38)}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审查人罗志如评价该书“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之整理,颇有独到之处,不但引用古籍至为精审,且对于各代之经济特征,务能提出显要正确之判断”;赵兰坪认为该书的贡献“在将中国国民经济史简单化、系统化”^②。秦佩珩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史》“此书如其说是一本单纯的中国经济史的论著看,勿宁视作为‘东亚经济与西欧经济所以分歧的重要标志’”,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体系,对中西经济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36]。

罗章龙主张经济史学的民族性和国家性,虽深受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却并不直接照搬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是国内经济学界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经济思想呈现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南地区的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地处中部,属于传统的内陆型经济,也有较为浓厚的革命氛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而广东沿海地区商贸业发达,具备西方应用经济理论传播和实践的土壤,财政学、会计学、贸易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活跃。

二是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南地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南财经学院的多位学者更是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阶级斗争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经济史学等方面的传播和研究成果丰硕。

三是鲜明的应用型特色。从学科分布来看,财政学、会计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都基本覆盖。从研究导向来看,多为应用型研究和政策性研究,围绕财政改革、币制改革、土地改革、乡村振兴、关税保护、合作事业、战时经济、稳定金融、贸易平衡等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经世济民、学术报国”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档案馆1957年馆藏资料统计。

②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简明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二章,当时,全国188所高校教授总人数4746人,校均25人。

③《图书评论》创办于1932年9月,由国立编译馆刘英士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梁实秋、千家驹、吴晗、顾颉刚等知名学者,是当时一本较有份量的官方书评期刊。

④赵兰坪、陈岱孙审查意见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全国学术团体报告表及学术奖励摘要》,档案号五-1351。

⑤限于篇幅,关于学者的生平简介和著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⑥根据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七章第二节所述,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7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译著共出版140部,其中翻译本占到70%以上,自撰的不到1/3。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处于翻译阶段。

⑦据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自述。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判断如译本还留存,可算最早译本。

⑧根据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六章第三节所述,五四运动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财政学著作189部(包括1901~1919年的14部),经济学原理著作188部(包括1901~1919年的2部),货币学著作177部(包括1901~1919年的2部),会计学著作159部,农业经济著作147部。

⑨1940年,民国经济学界以“研究农民经济促进农村建设,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为宗旨,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于右任、冯玉祥、孙科、孔祥熙等知名人士担任荣誉理事,郭沫若、陈豹隐等知名学者担任监事,何公敢、史维焕、董时进、朱剑农、刘光华、陈绥荪等担任理事,胡善恒、郑麟翔等担任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除朱剑农、刘光华外,陈绥荪、胡善恒、郑麟翔也是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⑩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是由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服务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大型丛书,从1933年开始正式推出,历时9年,出版著作约300种。商务印书馆聘请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55位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丛书委员会委员,对丛书的质量进行

严格把关。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对已出版的大学用书进行甄选审查。1942年起,商务印书馆不再自主新编“大学丛书”。部定大学用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和正中书局分别印行。参见范军《20世纪30年代商务版“大学丛书”的策划与运作》,《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⑪立信会计丛书是民国时期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编的一套会计理论书籍,是我国会计学术著作中最为完整的成套会计丛书。该丛书1933年由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发起主编,截至1949年共出版《会计学》《审计学》《银行会计》等57部,为会计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大量教材和参考书。

⑫《图书季刊》1945年第6卷第1—2期“图书介绍”栏目对《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进行了评介。

⑬罗志如、赵兰坪审查意见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一九四五年度学术奖励著作申请书及审查意见》,档案号五-1360(2)。

参考文献:

- [1] 李权时.评胡著公债论[J].复旦学报,1937,(4):213—217.
- [2] 杨祖义,冯兵兵.走出“欧洲中心论”:罗章龙的经济史思想探研[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2—118.
- [3] 洪思予.试论罗章龙的社会经济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0.
- [4] 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5] 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6] 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7] 三田刚史.朱剑农的农村经济论[J].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2019,(2):93—102.
- [8] 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J].经济研究,2018,(7):182—197.
- [9] 张爱勇.战后广东省会计事业研究(1946—1949)[D].广州:暨南大学,2013.
- [10] 张申,信瑶瑶.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0,(9):108—122.
- [11] 倪俊明.近现代广东历史学研究概述[J].广东史志,2002,(3):69—77.
- [12] 颜昌盛.民国《乡村建设》(1931—1937)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2.
- [13] 夏国祥.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 1900—1949[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14] 英士.社会经济概论[J].图书评论,1932,(2):93.
- [15] 傅筑夫.马哲民编著的社会经济概论[J].图书评论,1932,(3):35—46.
- [16] 罗仲言.三十五年来经济改革成败论[J].经济评论,1946,(2):1—4.
- [17] 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84—87.
- [18] 吕调阳.民生主义经济学[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
- [19] 刘耀燊.养民经济论[M].北京:民族文化出版社,1940.
- [20] 吴澄华.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之试探——价值论、生产论、分配论[J].华大经济学报,1944,(1):1—55.
- [21] 曾仲谋.中国民族经济的本质[J].财政知识,1944,(2—3):10—15.
- [22] 翁有为.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8,(7):184—208.
- [23] 朱剑农.农村经济[M].上海:中华书局,1948.
- [24] 刘光华.农业政策[M].南京:南京书店,1932.
- [25] 刘光华.论民生主义的农业政策[J].经济汇报,1941,(8):8—16.
- [26] 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7] 张人价.湖南之谷米[M].长沙:湖南省经济调查所,1936.
- [28]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29] 李权时.评胡著赋税论[J].经济学季刊,1935,(1):183—187.
- [30] 梁式文.财政学大纲[M].广州:广州大学出版组,1946.
- [31] 吕调阳.三民主义财政学[J].民族文化,1942,(8—9):52—56.
- [32] 启尔邦.货币银行原理(上册)[M].方铭竹,王清彬,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33] 侯厚吉.平衡国际贸易问题[J].新中华,1936,(8):35—38.
- [34] 刘耀燊.国际贸易之政策与其理论[J].新建设,1942,(7—8):413—423.
- [35] 罗仲言.经济史学原论[M].长沙:经济新潮社,1947.
- [36] 秦佩珩.评罗仲言著“中国国民经济史”[J].经济论评,1946,(5):14—15.

(责任编辑:姜晶晶)